

年鉴编纂研究的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分析

李 勇 *

摘要 采用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方法及文本研究方法,通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有关年鉴编纂研究的 1185 篇文献进行计量和文本分析研究,发现年鉴编纂研究于 20 世纪 80 年代起步并呈现阶段性;地方志、年鉴部门人员是主要研究力量;年鉴创新与规范、地方综合年鉴、年鉴编纂、体例与条目、年鉴撰稿与编辑等是研究的几大领域;年鉴的社会服务功能、年鉴的数字化和信息化、年鉴的规范和科学性、年鉴与文化强国建设等内容是当前研究的主要热点和趋势。在今后年鉴研究中,应加强理论研究与创新性研究,丰富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域,开展跨学科研究。

关键词 年鉴编纂 文献计量 知识图谱

年鉴事业是地方志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年鉴编纂出版迅猛发展,年鉴编纂研究也随之起步、发展。2016 年《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发布,提出“加强年鉴理论研究”,“力争到 2020 年形成较为成熟的年鉴学学科体系”。^① 在规划的重要节点 2020 年到来之际,亟需对国内年鉴理论研究现状进行梳理、评估。目前,学术界对年鉴研究的现状仅有少数几篇回顾性的文章,且多数是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在研究方法上,多总结归纳,在时段上,多集中在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缺乏对这一领域总体性、系统性、长时段的研究。基于此,为详细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年鉴编纂研究概貌、主要领域和发展趋势,弥补现有研究不足,对该领域的文献采取文献计量和知识图谱方法及文本研究方法进行计量和文本分析,以便更好地指导年鉴理论研究,促进年鉴事业发展。

* 李勇,男,山东省济宁市人,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史志、年鉴学。

① 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2016 年 12 月 22 日。

一、研究设计

(一) 方法与工具

研究采用文献计量分析和知识图谱分析方法。文献计量分析是采用计量学原理,运用数学、统计学对文献的标题、关键词、作者、机构、发表年度等外部特征信息进行统计分析,进而描述和评价某一学术领域的研究现状。^① 知识图谱是指对大量文献信息,借助统计学、图论、计算机技术等手段,以可视化的方式呈现研究对象的内在结构、发展历程、研究前沿等信息的一种计量学方法。文献计量分析与知识图谱分析相结合,以定量研究为主,定性分析为辅,可以比较全面、客观地分析研究概况、发展动态和趋势。

研究主要使用 Bicomb 文献计量软件,它是由中国医科大学医学信息学系教授崔雷和沈阳市弘盛计算机技术有限公司开发的共词分析软件,使用 Bicomb 软件可以便捷实现对大量文献外部特征的计量统计。VOSviewer 软件是由荷兰莱顿大学开发的一款用来构建和查看知识图谱免费软件,主要用于对大数据的处理,通过“网络数据”的关系构建,实现科学知识图谱的绘制,展现知识领域的结构、进化、合作等关系,以距离和密度强度来描述共现词语的关系,从而形成聚类图谱,进而查看研究的分布领域及研究热点。

(二) 数据样本与处理

数据和研究样本的选择是文本研究的前提基础。研究以 CNKI(中国知网)期刊数据为样本,以“(主题 = 年鉴编纂\题名 = 年鉴编纂)或者(关键词 = 年鉴)”为条件在中国知网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检索,检索时间段未设上限,下限为 2019 年 12 月 26 日,共检索文献 1549 篇,剔除会议综述、培训信息、出版信息等非学术成果类文献后,得到有效文献 1185 篇。

(三) 研究过程

首先使用 Bicomb 软件对文献样本的机构、期刊、发表年度等信息进行初步计量统计,对发表年度、作者所在单位、发表刊物等文献基本信息进行提取和频次统计,呈现年鉴学研究的基本概貌。其次,使用 VOSviewer 软件对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绘制知识图谱,结合文献阅读,分析年鉴编纂研究的主要领域、研究前沿。

二、研究发现

(一) 基于文献外部特征的计量分析

1. 年鉴编纂研究文献数量的年度分布

文献数量是衡量一门科学发展的重要指标。为尽可能全面地反映其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研究中主要使用文献年度产出数量和累积量两项指标。对年鉴编纂文献的年度产出量和年度累积量进行统计,并按时序绘制趋势图以直观呈现年鉴编纂研究的发展。如图 1 所示,就检索

^① 邱均平、王曰芬:《文献计量内容分析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 年,第 2~3 页。

所得文献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关于年鉴编纂的文献最早出现于1983年,而后年度文献产出数量总体呈现逐年增长趋势。根据文献数量年度分布及增长趋势,年鉴编纂研究可以分为6个时期。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年鉴编纂极少,关于年鉴编纂的理论研究也就相对缺乏。原因在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文化事业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是对于年鉴出版的重视程度还不够”^①。有学者研究认为,“在‘文革’前,中国可以说没有年鉴”^②,年鉴编纂研究同样缺乏。二是从1978年到1993年,年鉴编纂研究的起步期。这一时期,年平均产出文献2.45篇,年鉴编纂研究文献处于缓慢增加中。究其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年鉴出版受到重视。1979年,邓小平在与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负责人谈话中指示:“编辑出版年鉴,很有必要,这是国家的需要,‘四化’建设的需要。”中国年鉴随之出现爆发式的发展,大量年鉴出版,迎来“年鉴热”,年鉴编纂的理论研究也开始出现。三是从1994年到1999年,年鉴编纂研究的发展期。这一时期年鉴编纂文献数量大量增加,文献年均产出数量达到21.5篇。这一时期,不仅出现了覆盖“有省、省辖市、地区、县等多级综合性年鉴”,而且“各行各业大都有相应的年鉴出版”,“多次召开年鉴经验交流会或学术研讨会等活动”,^③推动了年鉴编纂研究,文献数量持续猛增。四是2000年到2005年,年鉴编纂研究快速发展期。这一时期文献数量猛增,年均增长文献43.5篇。五是从2006年到2011年,这一时期部分年份文献产出有一定下降,但总体呈现稳定增长,年均49篇。2006年,国务院颁布《地方志工作条例》,把地方综合年鉴纳入地方志范围内,并确立了地方综合年鉴的出版批准制度,推动并规范了全国地方综合年鉴编纂工作的开展。六是2012年以来,迎来一个年鉴编纂研究的高潮。从2012年到2018年年均增长文献54篇。国务院办公厅于2015年印发《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于2016年印发《全国年鉴事业发展规划(2016—2020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年鉴编纂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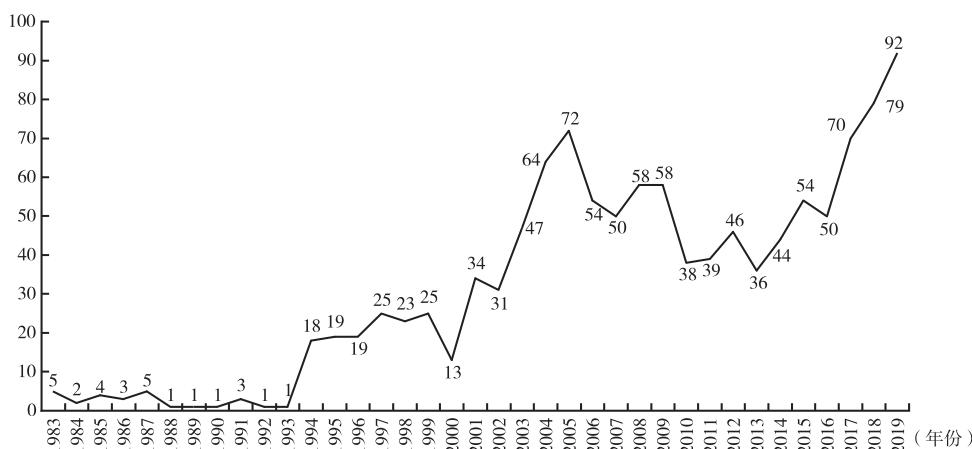


图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年鉴编纂研究文献的年度产出数量趋势图

① 范玉玲:《中国年鉴出版历程及发展规律研究》,北京印刷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② 邓伟志:《回忆年鉴的初创》,上海市辞书学会秘书处编:《辞书论集(二)》,2012年,第23~26页。

③ 肖东发:《90年代中国年鉴事业的发展趋势》,《年鉴工作与研究》1994年第1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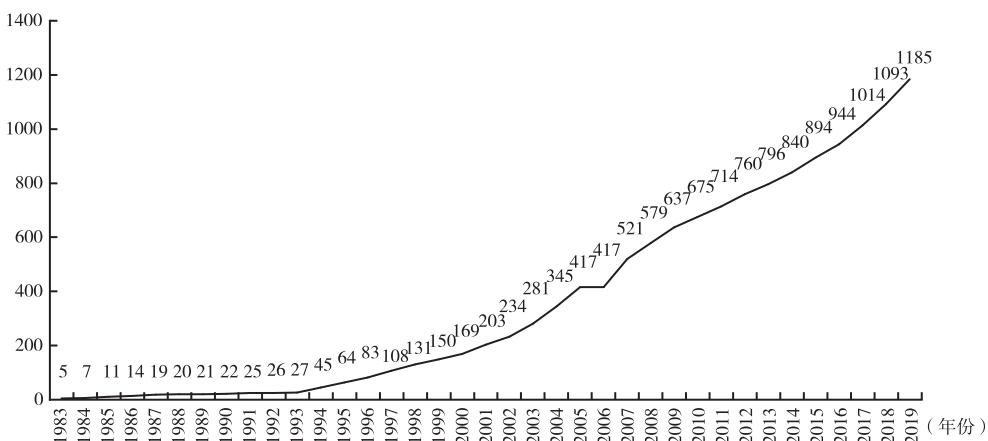


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年鉴编纂研究文献的年度累积数量趋势图

2. 年鉴编纂研究文献的期刊分布

对 1185 篇文献所在的期刊进行统计,共有期刊 199 种,文献的期刊分布比较集中。其中频次最高的是《年鉴信息与研究》,出现 282 次,占比为 23.81%。对频次 ≥ 4 的期刊进行统计,共有期刊 24 种,总频次 922 次,发文数占比 77.87%,反映出年鉴编纂研究的期刊分布非常集中。年鉴研究、地方志、图书馆、出版等方面的期刊是年鉴编纂研究成果发表的主要期刊。

表 1 年鉴编纂研究文献期刊分布统计(局部)(频次 ≥ 4)

序号	刊名	频次	序号	刊名	频次	序号	刊名	频次
1	年鉴信息与研究	282	9	上海地方志	20	17	军事历史	8
2	中国地方志	92	10	史志学刊	17	18	现代情报	6
3	黑龙江史志	91	11	福建史志	15	19	学习与探索	6
4	广西地方志	86	12	兰台世界	15	20	河北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5
5	新疆地方志	80	13	辞书研究	14	21	图书馆学研究	4
6	江苏地方志	64	14	年鉴工作与研究	11	22	农业图书情报学刊	4
7	中国年鉴研究	43	15	办公室业务	8	23	科技与出版	4
8	沧桑	35	16	浙江档案	8	24	江苏科技信息	4

3. 年鉴编纂研究的作者分析

对 1185 篇文献作者进行统计,共有作者 949 人。发文量 2 篇以上的只有 186 人,大部分作者发文量只有 1 篇,作者分布比较分散。使用 VOSviewer 软件对作者进行网络分析,如图 3,图中圆点大小代表作者文献数量多少,点之间连线反映点所代表的作者间具有合作关系。许家康、方亚光、詹跃华、马艾民、阳晓儒、唐剑平、陆奇、俞富江等文献数量较多。949 个作者,点间连线只有 243 条,没有形成密集的网络,反映了大部

分作者在年鉴编纂研究上是孤立的,缺乏研究上的合作。作者所在机构多为地方史志部门、年鉴编辑部、出版社等年鉴编纂出版部门,绝大部分作者都是年鉴编纂出版的一线实践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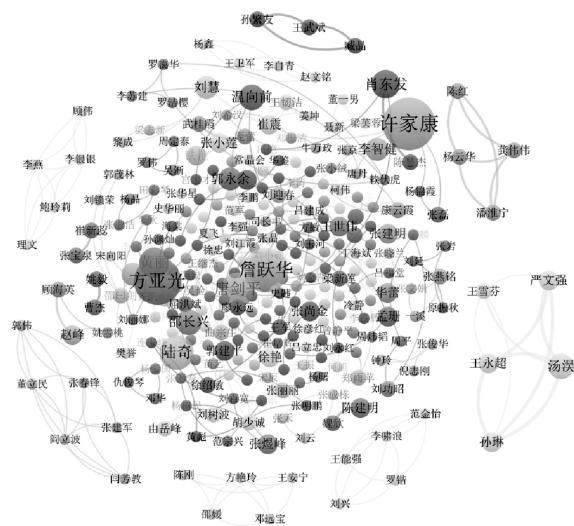


图3 年鉴编纂研究的作者网络图谱

(二) 基于关键词共现的知识图谱分析

文献的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献内容的浓缩和提炼,能够代表文献主要内容,通过对关键词出现频次的分析,可以确定领域研究重点内容和发展方向。

1. 高频关键词

样本文献 1185 篇,关键词 2169 个,总词次 5826 次。关键词分布较为集中,频次 ≥ 12 次关键词有 58 个,占关键词数量的 2.67%,词频总数达到 2384 次,占比达到 41.12%。

2. 年鉴编纂研究的主要领域——关键词聚类分析

对频次 ≥ 3 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共有关键词 326 个,形成 5 个较为清晰的聚类群落。如图 3 所示,颜色一致的关键词属于同一个聚类,聚类轮廓比较清晰,类群间重叠较少,形成了良好的聚类群;聚类群内关键词节点呈现较强关联度,共有连线 3879 条,形成了较为密集的网络,具有较强解释性。

聚类 1:年鉴。这一聚类中频次较高的关键词有创新、质量、编纂、高校年鉴、企业年鉴、地方特色等。创新是年鉴事业的发展战略,^①也是年鉴编纂研究的主要内容,市场经济规律和年鉴自身发展规律则是年鉴创新的动力。^② 研究中主要论及编纂理念、编纂方式、编纂内容、年鉴体例、条目、照片使用等方面创新,度量创新与规范的关系也一度成

^① 许家康:《创新是年鉴事业发展的战略性选择》,《史志学刊》2015 年第 6 期。

^② 房德胜:《论年鉴创新的三个问题》,《年鉴信息与研究》2002 年第 2 期。

为年鉴研究热议的话题。^① 质量是年鉴的生命,无论是规范、还是创新,都服务于质量,两者都是提高编纂质量的手段。“年鉴质量是指年鉴适合社会和读者需要所具备的特性,分为内在质量和外观质量。”^②年鉴的内容、层次结构、体例、文字写作、图表等内部因素的好坏决定了年鉴内在质量的优劣。要从撰稿、编辑和校对等三个环节控制提高质量,^③探索建立年鉴质量标准和质量评价体系。

表2 年鉴编纂文献高频关键词表(局部)频次≥21

序号	关键字段	出现频次	序号	关键字段	出现频次
1	年鉴	400	19	稿件	33
2	年鉴编纂	199	20	资料性	32
3	条目	137	21	高校年鉴	31
4	地方综合年鉴	110	22	分目	30
5	创新	105	23	体例	29
6	编辑部	81	24	企业年鉴	29
7	地方志	64	25	框架结构	28
8	出版	62	26	编辑人员	26
9	年鉴工作	60	27	工具书	26
10	质量	59	28	年鉴条目	25
11	编纂	54	29	编纂出版	24
12	编纂工作	53	30	地方年鉴	24
13	志书	43	31	类目	24
14	方志	39	32	修志	23
15	读者	38	33	志目	21
16	编辑	38	34	中国年鉴	21
17	地方志办公室	38	35	标题	21
18	综合性年鉴	34			

聚类2:地方综合年鉴。地方志、修志、地方年鉴、编辑人员等是这一聚类中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地方综合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地方综合年鉴是地方志的一种。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与修志有着密

- ^① 唐剑平:《关于年鉴创新与规范的思考》,《学理论》2011年第21期;许家康:《年鉴创新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年鉴信息与研究》2004年第1期;杨立鑫:《关于年鉴创新的思考》,《保山师专学报》2003年第6期;胡新力:《也谈年鉴规范与创新》,《年鉴信息与研究》2002年第4期;孙关龙:《创新,21世纪中国年鉴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年鉴信息与研究》2001年第3期。
- ^② 苏伯华:《年鉴编纂质量管理浅论》,《年鉴信息与研究》1997年第3期。
- ^③ 张嫖:《试论年鉴的质量效益原则——关于年鉴编纂流程技术性问题的思考》,《学习与探索》1997年第6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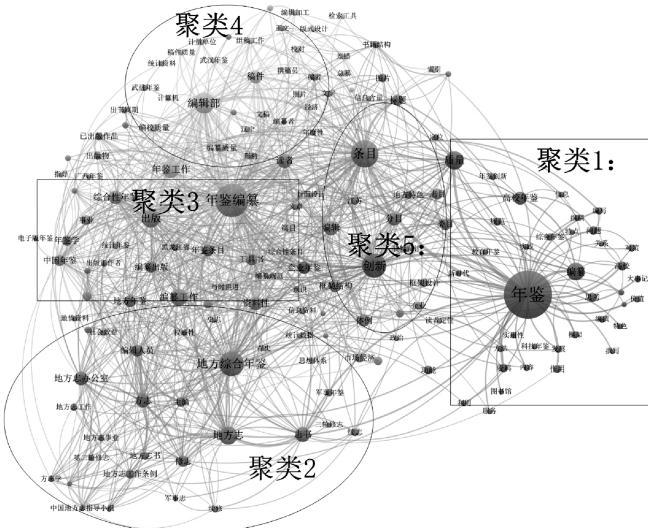


图 4 年鉴编纂研究文献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切关系。20世纪80年代开启了全国范围内修志工作,部分修志参与者感觉“没东西可写”^①,资料缺乏。因此在首轮修志之初,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要求,“为下届续修志书积累资料,编辑出版地方年鉴。”^②伴随着首轮修志,各级地方综合年鉴不断涌现,出现了“年鉴热”,修志推动了年鉴编纂,地方综合年鉴编纂也成为地方志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不少地方开始组织本地域的综合性年鉴编纂出版,同时也带动了部门、行业年鉴的编辑出版。

聚类3:年鉴编纂。年鉴编纂是年鉴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结合最为密切的部分。这一聚类中频次较高的关键词主要有出版、编纂工作、综合性年鉴、资料性、工具书等。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大量年鉴的出版,对年鉴出版的研究也日益增多,有出版报道、出版情况统计以及出版相关研究,其中出版质量、出版时效是长期受关注的问题,提出了“年鉴加快出版与保证质量”“年鉴出版与信息时效”等研究方向^③。近年来,信息网络技术发展,网络化出版成为研究的关注点。有学者指出,当前年鉴出版事业存在“内容重复刊发、同质化、出版普遍滞后、发行量普遍偏少、年鉴普遍没有数字化”^④等问题。就年鉴分类简单来说,可以分为综合性和专业性;综合性年鉴是年鉴家族的主干。无论是综合性年鉴还是专业性年鉴,其基本功能和性质是一致的,就是年鉴的资料性和工具性,这也是年鉴编纂的主要

① 高长安:《如何弥补第一轮修志的遗憾》,《广西地方志》2007年第2期。

② 《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第五次会议讨论通过)》,《新疆地方志通讯》1985年第3期。

③ 刘瑜:《如何处理好年鉴加快出版与保证质量问题》,《年鉴信息与研究》1999年第3期。

④ 吕鸿雁:《我国年鉴编辑出版存在的问题与成因》,《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6年第12期。

着力点，“丰富多样，类型齐全，准确权威，系统有效”^①成为鉴书资料性评价的主要标准。

聚类 4：编辑部、年鉴工作、组稿工作、稿件、编校质量。这一聚类主要是年鉴编辑部及其作品内容的研究。编辑部在年鉴编纂出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有着重要地位。“编辑部一方面要承担组织稿件、编辑、校对、印刷、出版发行、经营管理的重任，另一方面要承担联系编委会和编写组的责任。可以说，一部年鉴的生存、发展关键在于编辑部的建设。”^②加强年鉴编辑部建设，使其具有研究功能，“编辑要兼搞科研任务，经常研究问题”^③。组稿和编校是编辑部年鉴工作的主要内容。组稿工作直接关系着稿件的数量和质量，有学者提出改革传统组稿模式，在巩固原有供稿网络的同时，实行采编制。“建立年鉴采编部，增加年鉴供稿渠道，采集鲜活的资料文稿。”^④编校质量是年鉴质量的关键，提高编校质量，应“加强内部管理，提高编辑人员的自身素质与主动创新意识，增强责任感”，实行“编辑审稿和专家审稿相结合”^⑤。在编纂工序上，把好“来稿质量关，编辑质量关，统稿质量关，从规范和制度上，积极构筑质量保证体系”^⑥。

聚类 5：条目、框架结构、体例、分目、类目、框架设计、标题、图片。这一聚类主要是关于年鉴编纂的体例、框架、条目的研究。年鉴框架结构是全书的纲目，是内容的总体设计，是承载各种资料信息的基本架构，框架设计要符合年鉴体例，做到结构栏目化，主体内容条目化。^⑦ 年鉴一般分类目、分目和条目等层次。条目是年鉴的主要载体，是年鉴的基本单元和表现形式，决定年鉴的质量。有学者提出，好的年鉴条目必须具备资料性、规范性、完整性、写实性、简洁性、独立性、类从性、创新性等特性。^⑧ 条目标题在年鉴中具有独特作用，它既是条目内容的聚焦点，也是读者检索资料、获取信息的重要途径。“年鉴条目标题的拟定，一般要求在准确概括内容主题的基础上，做到个性突出、文字精炼、便于检索。”^⑨ 有学者针对年鉴编纂中标题出现的问题，提出标题要符合要实、求简、明确、贴切、题文要相符、标题适中、行文一行、准确、正确记述涉法问题、正确记述涉外问题 10 个方面的要求^⑩。图片资料是年鉴资料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形象直观，能够真实反映历史变迁而受到年鉴编纂者的重视，年鉴图片的选择、使用及开发利用也成为研究的重要内容。

3. 年鉴编纂研究的前沿问题——关键词历时分析

VOSviewer 软件在关键词共现分析时提供一种权重视图(Overlay visualization)，关键词依据年代给予赋权，默认颜色范围为蓝色(最低分数)到绿色到黄色(最高分数)，对图

① 孙关龙：《年鉴的性质和特点》，《年鉴信息与研究》2007 年增刊 1 期。

② 房德胜：《加强编辑部建设是年鉴发展的关键》，《年鉴信息与研究》1995 年第 4 期。

③ 凌岩、顾端华：《年鉴编辑部应具研究功能》，《年鉴信息与研究》1995 年第 1 期。

④ 周宏文：《年鉴运行机制创新之我见》，《广西地方志》2005 年第 5 期。

⑤ 邸荣芬：《年鉴编校质量之思考》，《年鉴信息与研究》2006 年第 2 期。

⑥ 孙铎：《提高年鉴编纂质量的基本思路》，《年鉴信息与研究》2009 年第 1 期。

⑦ 胡少诚、任一丁：《高校年鉴框架设计的比较分析》，《中国年鉴研究》2017 年第 1 期。

⑧ 孙铎：《浅谈地方综合年鉴条目之特点》，《江苏地方志》2005 年第 3 期。

⑨ 铁艳、张小莲：《浅议年鉴条目标题的拟定》，《黑龙江史志》2015 年第 15 期。

⑩ 赵庚奇：《年鉴标题十论》，《中国地方志》2015 年第 12 期。

谱进行去色处理,越接近浅色的,权重数值越大,越接近现在,反映该领域研究的前沿。图5呈现浅颜色的关键词代表当前年鉴编纂研究的前沿热点,主要集中在年鉴这一聚类中。结合软件查看,主要关键词有:社会服务功能、时效性、实用、开发利用,数字化、信息化,规范、科学性,高校年鉴、军事年鉴,文化自信等。这些关键词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当前年鉴编纂研究的前沿要点。一是注重年鉴的社会服务功能,认为“社会服务功能才是年鉴的核心功能”^①,“服务社会是新时代年鉴的首要功能”^②。要求重视提高年鉴的时效性和实用性,“收录全面、翔实、权威、精准的地情信息”^③,以便于更好的资政、服务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二是年鉴的数字化、信息化。在传统媒体都在寻求转型的信息化时代,年鉴应该加快数字化的进程,^④提出数字年鉴、地方志网站、手机APP和微信公众号等实现信息化年鉴的途径。^⑤三是年鉴的规范性、科学性。一方面,年鉴编纂的数量越来越多,管理水平、编纂质量参差不齐,有待进一步规范;^⑥另一方面,2000年以来年鉴编纂创新不断探索,但也出现背离年鉴基本属性的情况,“创新”亦需规范。^⑦四是高校年鉴、军事年鉴。高校年鉴编纂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2017年以来,相关研究文献年度增加较大,反映高校年鉴工作者对年鉴理论研究的重视,研究主要围绕可持续发展,开展问题、对策研究,提高编纂质量。五是文化自信。2016年以来,与文化自信相关的年鉴编纂研究文献开始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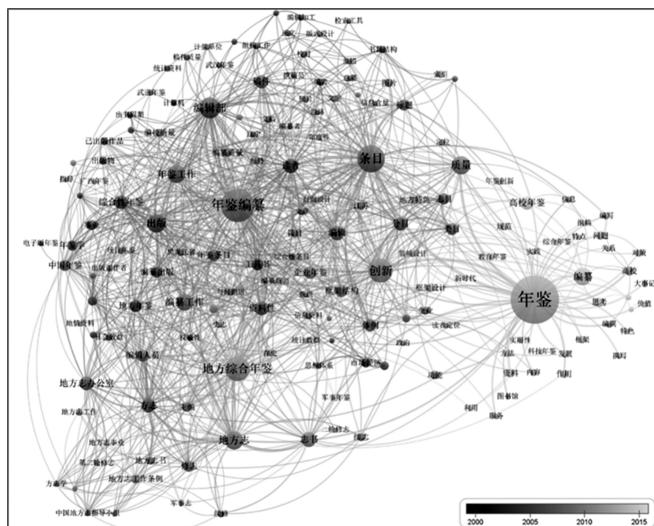


图5 年鉴编纂研究文献关键词演进知识图谱

- ① 徐艳:《新时代拓展年鉴社会服务功能刍议》,《新疆地方志》2018年第2期。
- ② 蓝武:《新时代年鉴的社会服务功能多元化拓展研究》,《中国年鉴研究》2018年第2期。
- ③ 王淑红:《如何提高地方年鉴的实用价值》,《黑龙江史志》2017年第10期。
- ④ 文国庆:《浅谈年鉴的数字化发展》,《数字传媒研究》2016年第11期。
- ⑤ 林忠玉:《试论信息化时代年鉴发展的新态势》,《福建史志》2016年第3期。
- ⑥ 冯松:《浅谈地方综合年鉴的编写与规范》,《福建史志》2016年第5期。
- ⑦ 齐迎春:《年鉴编纂规范与年鉴学范式的构建》,《上海地方志》2018年第4期。

年鉴作为当代中国文化宝库的组成部分,年鉴编纂出版有利于增强人民文化自信;同样,在年鉴编纂中应坚持中国年鉴文化自信,不盲目照抄照搬国外模式,探索中国特色年鉴发展道路。

三、结论与建议

综上所述,年鉴研究虽取得一定成果,但理论研究还远不能起到指导工作实践的需要。一是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年鉴编纂研究不断发展。我国的年鉴编纂研究起步于 20 世纪 80 年代,伴随年鉴编纂“出版热”出现。年度文献量由最初的零星几篇到十几篇、几十篇,反映年鉴理论研究的进步,同样也从一定层面反映年鉴事业的发展。二是研究者多是从事年鉴编纂、出版工作的一线从业者,大部分来自于年鉴编辑部门、地方志机构等,有丰富的年鉴编纂工作经历。研究者之间没有形成密切合作关系,多进行独立研究,合作研究较少。三是在研究聚类上,主要有年鉴创新与规范、地方综合年鉴、年鉴编纂、编辑部、条目和框架等五大领域。就其内容而言,实践应用研究与理论研究相互交织,且多为实践应用研究、经验研究。在理论研究方面,缺乏理论探究的广度和深度。

年鉴编纂研究需要不断探索、创新,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未来研究可关注以下几方面。

一是加强理论研究与创新性研究,提升研究对现实的指导性意义。增加年鉴理论研究的比重,从编纂体例、条目、内容、年鉴编纂出版流程、编辑及撰稿人员素养提升等不同角度探索年鉴研究理论,拓宽理论探究的广度和深度,产生能够指导现实实践的理论成果。注重年鉴创新性研究,结合年鉴编辑出版的现状,从体例、内容、形式等方面开展年鉴创新研究,以指导年鉴编纂创新性发展。

二是丰富研究方法,拓宽研究视域。现有的研究方法多为经验研究,应大力引入如文献研究、个案研究、系统科学法、比较法等新的研究方法。通过文献研究,对现有的年鉴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了解研究现状和不足;对某一部年鉴或某一类年鉴开展个案研究,系统考察发展历程、特征、结构,分析其成功之处与不足;利用系统论观点,对年鉴编纂、出版整个流程进行研究分析,探究可推广的成功模式,提高年鉴编纂的效率和质量;开展比较研究,如进一步开展中外对比、古今对比、不同类型年鉴对比等研究。

三是加强跨学科研究及合作研究。年鉴编纂涉及方志学、辞书学、编辑学、目录学、图书馆学等不同学科,各专业性年鉴涉及的学科更是丰富多样。在年鉴编纂研究上,应当重视跨学科、跨领域研究,开展年鉴学与方志学、信息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多学科合作研究。加强合作研究,搭建年鉴研究交流合作平台,促进高校、研究机构理论研究者与地方志机构等实践研究者之间的合作,促进年鉴编辑与年鉴撰稿者之间的合作,以及年鉴编辑部和出版社之间的合作,打破原来各自独立、封闭单干的研究模式,增强研究的丰富性、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更好地指导年鉴编纂出版。

责任编辑:范锐超